

别让儿童成为微短剧“工具人”

文明棱镜

看见问题的每一面

编者按

近期，一部名为《逼锦鲤替嫁活阎王，相府气运全断了》的短剧，引发众怒。据报道，该剧选用了年仅11岁的女童饰演“替嫁新娘”，还包含7岁被迫嫁人、15岁生子等严重违背伦理的剧情，目前已被下架。

不知何时起，“萌娃”沦为流量密码，儿童类微短剧不断涌现，虽然丰富了微短剧题材类型，却呈现“野蛮生长”态势。1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提示，要求遏制“成人化”倾向，纠偏“工具化”倾向，抵制“娱乐化”倾向，为儿童类微短剧创作、审核、播出划定刚性红线。

本期《文明棱镜》关注儿童类微短剧“成人化”“工具化”“娱乐化”的表现、危害和治理路径，防止不当创作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现象篇

变异的微短剧正在消费“萌娃”

◎ 关育兵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萌娃”这一可爱角色，已被精心设计成工具和流量密码。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提示，要求遏制“成人化”倾向，纠偏“工具化”倾向，正当其时。

“成人化”的本质是对童年面貌的扭曲。在“成人化”的儿童类微短剧中，儿童不仅穿着成人化服饰，还被要求以超越年龄的行为方式进行表演，说着成人台词，演绎“霸道总裁”等剧情，塑造腹黑、心机等儿童形象，宣扬以恶制恶、权谋算计等观念。这种创作倾向，将复杂的成人议题简单移植到儿童语境中，使童年成为成人世界的微缩景观。更隐蔽的是，成人社会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也通过童言童语被悄然“正当化”。当6岁孩子

讨论“学区房的重要性”、8岁儿童比较“哪个品牌更显身份”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表演的失真，更是童年独立价值的消解。

“工具化”的核心是对童年价值的商业榨取。儿童类微短剧“工具化”，表现为家长与商业机构的“啃小”合谋。一些家庭将孩子视为可变现资产，把孩子当成满足成年人“一夜暴富”幻想的工具，安排孩子超负荷拍摄微短剧，甚至亲自把孩子的日常生活彻底脚本化——起床、吃饭、学习都成为拍摄素材。商业机构则宣扬“成名要趁早”，诱导家庭支付高额培训费、包装费；在商业模式上，将微短剧与商品推广深度绑定，孩子对玩具的“喜爱”、对零食的“渴望”都被精心设计，成为赚取利益的机会。更有甚者，一些创作者刻意制

造教育焦虑或亲子矛盾，只为植入培训产品或家庭服务。如此“工具化”操作，将童年异化为产业链条上的生产要素，儿童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可拆解、重组、变现的商业符号。

“娱乐化”的实质是童年纯真的系统性消解。当前的儿童类微短剧普遍陷入娱乐陷阱：内容选择上追逐浅层笑点，通过夸张表演、网络热梗制造、堆砌即时快感；价值传递上将复杂的品德教育简化为教条口号，将知识学习转化为碎片化信息灌输……如此“娱乐化”生产不仅降低了微短剧的文化品格，更塑造了一种扁平化的童年认知——深刻的思考、细腻的情感体验、审美的愉悦都被简化为即时的情绪反馈。当教育内容必须包装成“娱乐产品”才能被接受时，童年应有的纯真也在无形中丧失。

童年是每个人的宝贵财富。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坚决守护童年不可替代的本真价值，杜绝把儿童当成满足成年人“一夜暴富”幻想、情绪代偿或流量收割的“工具人”。

危害篇

儿童不应成“流量经济”试验田

◎ 舒爱民

近年来，儿童类微短剧成为资本逐利的新风口。然而，在这股“消费童年”的浪潮中，儿童不再是无忧无虑的成长个体，逐渐异化为被包装、被消费的“内容素材”。这种将儿童嵌入“流量经济”的试验，正带来多重深远、沉重的危害，令人忧心。

儿童的身体与精神被双重透支。微短剧拍摄节奏快、时间紧。据报道，不少儿童演员每日需长时间守在片场，重复表演、熬夜赶工已成家常便饭。他们本应自由奔跑，却被困在化妆间与摄影棚，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远超其生理承受能力，不仅影响他们的身体发育，更易造成心理焦虑、情绪障碍。长期处于表演状态的孩子，可能逐渐模糊真实与表演的界限，失去自然表达的能力，儿童的本真被表演的负荷层层包裹。

儿童的学业被耽误乃至荒废。儿童成长的关

键期，是知识积累与人格塑造的黄金阶段。然而，不少参演微短剧的孩子因拍摄需要频繁缺课，甚至长期脱离校园教育。家长或经纪人以“艺术发展”为名，将学业置于次要位置。当同龄人在课堂学习知识时，一些所谓的“小明星”却在背台词、练表情、应对镜头。一旦流量“退潮”、光环消散，他们或将面临既无学历支撑又无可持续职业能力的窘境。儿童被提前“职业化”，实则是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换取短暂曝光。

儿童的价值观和道德认知被扭曲。当一些孩子频繁出演“神童逆袭”、“萌娃”打脸大人”、“穿越救世”等剧情，他们潜移默化接受的是一种“以小博大”、“以萌制胜”的功利熏陶。剧中角色常被设定为“团宠”、“福星”、“战神附体”，现实中的孩子极易将这种虚幻人设内化为自我认知，滋生虚荣

心、优越感甚至操控他人的意识。部分剧集为制造戏剧冲突，让儿童演绎成人世界的情感纠葛、权力斗争，这无异于在其幼小心灵播下算计与对抗的种子。童年本应是道德启蒙的沃土，却在流量算计下被异化为“人设经营”的训练场。

家庭关系在流量追逐中发生畸变。部分家长将孩子视为“摇钱树”，主动充当经纪人，精心策划孩子的成名路径，甚至为上热搜制造有争议的内容。亲子关系从养育与陪伴，滑向利益捆绑与资源榨取。当父母的关注点从“孩子是否快乐”转向“今日有没有爆款”，家庭的情感功能便被工具化，孩子感受到的不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表现与流量挂钩的“绩效评价”。这种情感异化，可能在其成年后引发深层的信任危机与自我认同混乱。

儿童不能是“流量经济”的试验田，更不该成为资本狂欢的牺牲品。儿童的身心发展不可逆，一旦在成长关键期被过度消费，留下的可能是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镜头前的“萌态”终会消失，而被剥夺的时光、被扭曲的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可能伴随一生，成为人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治理篇

别让儿童类微短剧“野蛮生长”

◎ 许兵

儿童类微短剧本应是丰富儿童视听内容的新载体，却在流量裹挟下陷入“成人化”“工具化”“娱乐化”的“野蛮生长”困境。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管理提示虽划定了儿童类微短剧创作的刚性红线，但要真正守护童真、避免童年沦为“流量祭品”，亟须监管、平台、家庭形成共治合力，为儿童类微短剧的健康发展筑牢防线。

监管部门要加强创作监管和内容审核。一要建章立制，明确不同年龄段儿童参演艺术作品的禁区，并把“禁止超负荷拍摄”“不得演绎霸凌剧情”等要求细化为可落地的量化指标；二要对内容审查进行提级——目前我国已落实微短剧分类分层审核制度，重点微短剧由国家广电总局直接负责规划备案和成片审查；普通微短剧由省级以上广电主管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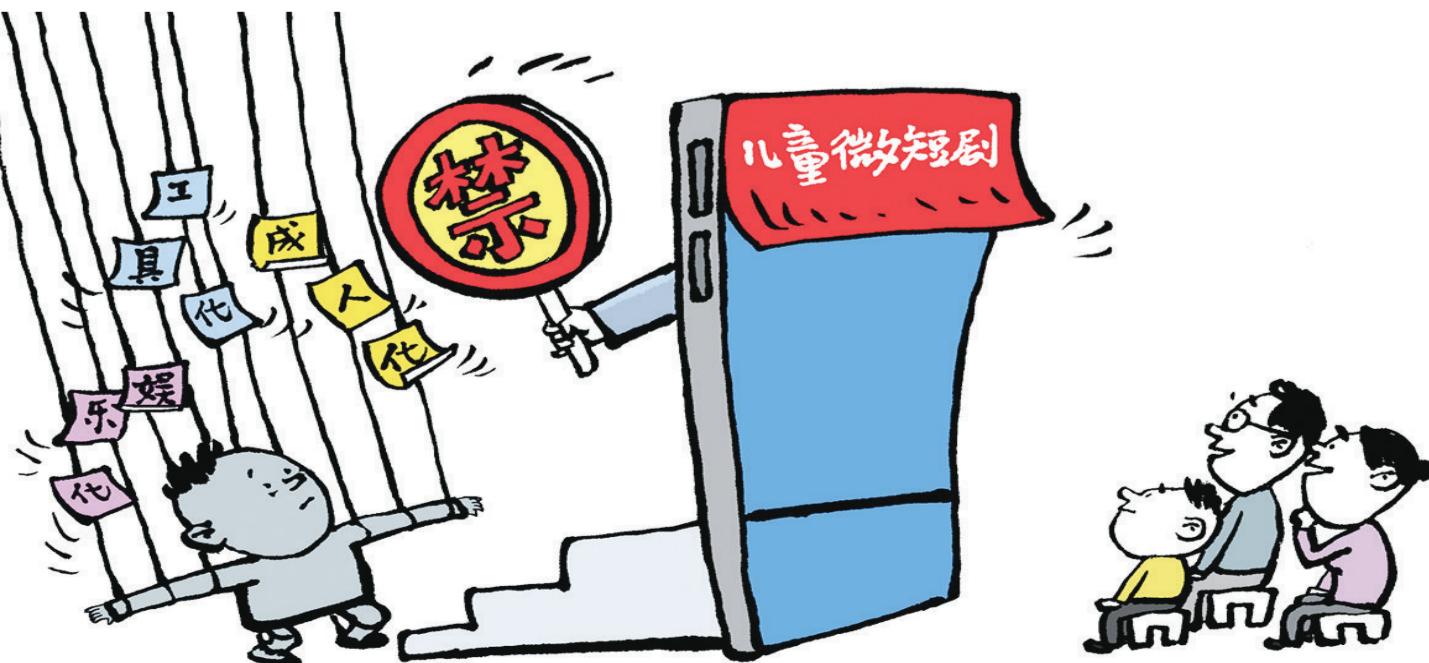
门负责规划备案和成片审查；其他微短剧由播出或

家庭要主动承担起守护责任。在儿童类微短

剧问题频现的背景下，家庭必须为孩子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要对孩子的自身条件和行业现状保持清醒认识，不逼迫孩子强走“童星路”，在短期诱惑与长远成长之间保持清醒选择，让孩子有一个快乐自由的童年。据报道，一些家长误以为孩子参演微短剧、电影电视剧“收入高、来钱快”，以侥幸心理投入其中。实际上，这个领域长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些商业机构往往利用家长的“望子成龙”心理，极力营造“门槛降低、人人可及”的假象，收割家长的钱包，套路层层推进。

如果家长盲目跟风，极可能使家庭沦为被割的“韭菜”，不仅损失金钱，荒废孩子的学业，也会弄丢了孩子的童年。

孩子的成长没有试错空间，儿童类微短剧的治理容不得半点懈怠。监管的刚性约束、平台的责任担当、家长的理性守护，三者缺一不可。唯有形成“监管定规则、平台守关口、家长筑防线”的共治格局，才能让儿童类微短剧告别“野蛮生长”，回归纯真，真正成为滋养童心、助力成长的精神食粮。



王怀申图

记住聂卫平，传承他宝贵的精神遗产

◎ 徐刚

1月14日晚，“棋圣”聂卫平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聂卫平是上世纪中国围棋振兴的关键人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中，他作为主将力挽狂澜，连胜多位日本超一流棋手，创造了“擂台神话”，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被当时的国家体委和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棋圣”称号。他的离去，不仅是中国围棋界的重大损失，也意味着一座精神坐标无声陨落。

对于亲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人而言，“聂卫平”这个名字，早已超越围棋本身，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图腾。那个年代，改革开放伊始，国门初开，民族信心亟待凝聚。中日围棋擂台赛在那个年代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荣誉之战”，他赢得的不仅是一盘盘棋局，更是一场提振全民士气的精神胜利。无数青少年因他而执起棋子，围棋从书斋雅事走入街头巷尾，升华为一股社会热潮。被授予“棋圣”称号，是对他技艺与贡献的至高肯定。

他的棋风厚重而灵动，大局观超群，善于在平淡局面中蓄势，常以弃子取势，以退为进，终成雷霆万钧之力。而他身上最打动人的，是那份于危局中临危不惧、愈挫愈勇的斗志。这种意志，恰与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奋发图强、渴望赢得世界认可的心态同频共振。

退役后，聂卫平从未远离围棋，他长期担任国家队总教练，悉心栽培新

人，几代世界冠军的成长之路都浸润着他的心血。他创办“聂卫平围棋道场”，为职业棋坛输送大量新生力量，被誉为“中国围棋的黄埔军校”。他积极走入校园、社区，借助媒体传播围棋文化，倡导“围棋育人”的理念——在他眼中，围棋不仅是竞技，更是修心养性、锤炼人格的途径。从巅峰争胜到躬身传道，他完成从“棋手”到“师者”的精神升华。到了晚年，即使健康不佳，聂卫平仍活跃于棋坛与一些公共领域，他敢于批评，也不吝鼓励新人，始终是中国围棋发展不可或缺的稳健声音。

今日中国围棋，早已步入群星璀璨的时代，在世界赛场上战绩彪炳。我们不应忘记，正是聂卫平这样一位开拓者，扭转了一个时代的棋运态势，为中国围棋的崛起奠定基石。他留下的，不仅是光辉的战绩与奖杯，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一份为国争光的使命担当，以及让古老智慧在现代社会重焕生机的文化自觉。

今天我们悼念聂卫平，不仅是缅怀一位杰出棋手，也在重温一段激荡人心的历史，赞叹一种可贵的品质——那种为了一项事业、一份信念，可以全神贯注、抑上一切的热忱与孤勇。在今天这个信息纷繁、选择众多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葆有那份“一子落而定乾坤”的专注？是否还能为了一个目标倾注全部心血、直面孤独与压力？

整治“躺平式”干部岂能摊派指标

◎ 郑勇钢

据《人民日报》1月12日报道，有干部留言反映，当地在整治“躺平式”干部期间，以“一刀切”方式摊派“躺平式”干部指标，要求每个单位至少报一名“躺平式”干部，且对“躺平式”干部诫勉谈话、提醒谈话，给单位和干部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众所周知，“躺平式”干部占着位置不做事、不管事，躺着、休闲着，是所有干部必须克服的不良作风，亟须重拳出击、从严治。整治“躺平式”干部本是利国利民的务实之举，然而，以摊派指标、凑数量应付了事，不仅背离整治初衷，更沦为新的形式主义，值得警惕与纠偏。

整治“躺平式”干部的核心是精准识别、靶向施治，既要对确实有不作为、慢作为现象的干部严肃问责，也要为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但“每个单位必报一人”的硬性要求，脱离实际工作情况，将复杂的干部作风问题简化为数字游戏。这种做法背后，是个别领导干部不愿深入调研、懒于细致甄别，试图用“完成率”掩盖不作为，用表面的“严格整治”应付上级部署，本质上与“躺平式”干部的不作为并无二致。

这种形式主义整治只会滋生新的问题与隐患。一方面，可能导致误伤。在指标压力下，一些单位为完成任务，难免将工作中偶有失误、性格内向或

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凑数”上报，让实干者寒心、无辜者“躺枪”。另一方面，会稀释整治效果，让真“躺平”者漏网。当整治精力耗费在“凑指标、填表格”上，就难以真正聚焦那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漠视群众诉求的“躺平”顽疾，最终使整治沦为“走过场”，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整治“躺平式”干部只是手段，让干部干起来、动起来才是目的。实际上，干部“躺平”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动力不足的“不想为”、能力不足的“不会为”，也有担心失误的“不敢为”、囿于困难的“不能为”。对待少数“躺平式”干部，不要一味讽刺和挖苦，更不能“一棍子打死”，而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比如，对思想滑坡、慵懒散漫的主动“躺平”者，要严肃诫勉、坚决调整；对能力不足、权责不清的被动“躺平”者，要加强培训赋能、厘清权责边界，用“精准滴灌”代替“大水漫灌”。

此外，还要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实干实绩作为核心标尺，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同时，要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让干部作风好坏由群众评判，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性循环。

司法托底，让见义勇为者敢“出手”

◎ 曲征

街头两人发生冲突，一方突然拾起铁锤欲对另一方施暴，危急关头，热心路人全先生将其扑倒，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惨剧。全先生事后却被欲行凶者诉至法院，索赔12万余元医疗费、营养费等损失。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涉及正当防卫认定的健康权纠纷案，法院认定，路人全先生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无需承担民事责任，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街头两人口角升级为持锤行凶，热心路人挺身而出扑倒施暴者，却反被索赔12万余元。现实中，类似“好人难做”的困境并不少见。有人想扶起摔倒老人怕被讹，有人想制止暴力怕担责，这种顾虑的背后，是见义勇为者面临着权益的不确定性。全先生本是出于善意劝架，在铁锤即将挥向他人的危急时刻果断出手，阻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而施暴者却将自身不法行为导致的损伤，转化为向防卫者索赔的诉求，无疑是对正义的错位解读。

法院的判决，精准踩准了法律与

情理的平衡点。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就是在公力救济无法及时介入时，赋予公民保护自身与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铁锤击头的风险足以危及生命，全先生扑倒施暴者、按住铁锤的行为，既未超出必要限度，更符合防卫目的的正当性。正如法官所言，不法侵害者理应对其自身行为导致的后果自担风险，而非将损失转嫁他人。

见义勇为是社会文明的底色，司法保障则是这份底色不褪色的关键。当每一次挺身而出都能得到法律的认可，每一份善意都能被温柔守护，人们才会敢于向恶行说“不”，社会才会充满正气与温暖。

值得深思的是，这场纠纷折射出部分人面对矛盾时的非理性姿态。施暴者本可采取协商或通过法律渠道化解与他人的矛盾与纠纷，却用拳头和铁锤激化矛盾，最终自食恶果。这提醒人们：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只会让小事酿成大祸。理性沟通、依法维权才是化解矛盾的正道；换位思考、多些包容，才能避免冲突升级。